

北京地方历史文献述略

王 灿 炽

首都北京是一座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，从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封召公于燕，至今已有三千零三十八年的历史了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历代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就是其中一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北京地方历史文献，主要是指记载北京地方历史的专著。自从燕都蓟城诞生以来，有关北京地方历史的记载就已经开始。在周代，有一部《燕春秋》，《墨子·明鬼篇》曾经引用过它，这是最早的一本北京地方历史书，可惜已经失传了。先秦时期所存的，只有清代孙星衍辑校的《燕丹子》三卷。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，此书是“先秦古书”，其写作时间在司马迁《史记》、刘向《战国策》之前，这本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。

从汉代到宋、辽、金时期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，大都散佚无存了。如汉代的《燕十事十篇》、北齐阳休之的《幽州人物志》三十卷、隋代的《幽州图经》、《幽都记》、唐代平致美的《蓟门纪乱》、宋代的《平燕录》、王安中的《入燕录》、许采的《陷燕记》等书，都已失传不见了。

元代的大都，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政治中心，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繁华都城。但对元大都的专门记述的书并不多，除了《大元一统志》中“大都路”部分，《元史·地理志》、《马可波罗

《罗游记》等书中有关记述外，其他元朝人的专著，如《皇元建都记》、《内府宫殿制作》、《大都志》、何中《蓟邠述游录》一卷等都已失传了。大家比较熟悉的熊自得的《析津志典》也久已失传。缪荃孙说：“熊自得《析津志典》，佚，见卢文弨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地理类。自得字梦祥，丰城人，崇文监丞。《日下旧闻》张鹏序引熊自得《燕京志》大约即此书也。”他又说：“《析津志》，未见，撰人卷数无考，《日下旧闻考》引用甚多。案：辽圣宗开泰元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，宋宣和五年，改燕山府，金天会元年复名析津府，贞元元年即改大兴府。此志明时所修，而曰析津，盖取古名也。”（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卷一二二《艺文志》一）缪荃孙认为《析津志典》和《析津志》是二部不同的书，前者是元代熊自得编纂的，而后者则是“明时所修”，这是一家之说。张国淦先生的《中国古方志考》则认为《析津志典》就是《析津志》，是熊梦祥在元朝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后修撰的，这又是一家之说。《析津志》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？谁写的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现在，《析津志》已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，北京存有几部，其中一部辑录了十四卷，书末有李盛铎的跋。我们现在想了解元大都的情况，只能见到明朝人萧洵写的《故宫遗录》等书。萧洵在洪武初任工部郎中，奉命随大臣到北平拆毁元大都旧宫城，他亲眼看到元大都宫城门阙楼台殿宇的美丽深邃，阑槛琐窗屏障的金碧流辉，园苑奇花异卉峰石罗列的高下曲折，因而他所记的材料十分宝贵，史料价值很高。

到了明代，记载北京的专书日益增多，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统计有121种，当时存而可见的十种。明代洪武年间修的第一部北京地方志——《洪武北平图经》早已失传，朱彝尊编纂《日下旧闻》时“博极群书，犹未得见”。明初的其他记述北平的专著，如《元掖庭记》、《北平志》四卷、《北平府图志》、刘崧《北平事迹》一卷等书都已失传了。

明朝初年曾修过一部《顺天府志》，但书已失传，我们只能从文渊阁书目中看到它的名字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二册《顺天

府志》，据考证是乾隆年间传抄明《永乐大典》本。

北京图书馆藏《顺天府志》残本一册，残存二卷，上卷卷末题明《永乐大典》卷四千六百五十卷，主要记述北京的寺、院、阁、塔、宫；下卷为观、庵及有关宛平县的户口、田粮、名宦等内容，此书主要辑录《析津志》、《大元一统志》、《輿地要览》、《图经志书》、《寰宇记》而成，字迹工整，记述较详，这是现存的最早的一本北京志书，是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特藏书中，有一部“艺风堂”传抄本《顺天府志》三册，残存八卷。书中有缪荃孙朱笔校阅，此书也是《永乐大典》的辑录本，它是当前所见最早的内容最为丰富的，经过整理和学者校订的北京志，是研究北京历史的宝贵资料。

到了明朝万历年间，当时的顺天府尹沈应文、府丞谭希思和大兴县丞张元芳等修纂了一部《(万历)顺天府志》。此书是现存的明代最完善的唯一的一部官修的北京志，为研究明代北京的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1959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刻本进行影印，才使这部书得以流传。

明代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写了一部《宛署杂记》，此书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原刻本藏于日本东京尊经阁文库，1961年北京出版社据万历刻本铅印发行，书中辑录了丰富的明代北京的史料，其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史料较为详细，书中开列的宛平县负担的坛庙、陵园、宫禁、考试等经费极为详细，从中可以了解封建统治者的反动腐朽，奢侈浪费，劳动人民负担沉重，生活困苦。此书史料价值很高，是研究明代北京史的难得的宝贵资料。

明代著名学者郭造卿写了一部《燕史》，过去许多人一直认为已经失传了。例如，朱彝尊编纂《日下旧闻》时，由于没有见到《燕史》而心里一直感到遗憾。缪荃孙等编纂《(光绪)顺天府志》时，也没有见到此书。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《天府广记》的“出版说明”中也说：“明郭造卿著《燕史》虽有120卷，但早已失

传了。”其实，这部书并没有失传，现在找到了二种抄本，都十分难得，十分宝贵。据清道光二十八年(1848)三月高锡藩的《燕史跋》可知，这部《燕史》是一个地方官在福建厦门一个旧绅士家作客时偶然发现的，后来辗转传抄，至今只见二种抄本，其中一部有陶斋校阅的朱印。今存的《燕史》仅有三十四卷，是郭造卿于万历九年(1581)所撰的，现存的有燕政记、统记、雄记、镇记、敌记、督记、道记、系记、裔记、朔记。全书约十六万四千多字，记事从汉到唐，不及宋、辽、金、元。据研究者说，此书还缺变记、追记、牧记、貂记、胡记、蕃记、寇记。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：“福之士人郭造卿，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志书略备，又自身行历蓟北诸边营垒，又遣卒至塞外，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，还报与书不合，则再遣复按，必得实乃止。作《燕史》数百卷，盖十年而成，则大将军已不及见。又以其余日，作《永平志》百三十卷。文理晦涩，而一方之故，颇称明悉。”（《顾亭林全集》）《燕史》的发现，为研究古代北京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。

到了清代，研究北京史的风气日盛，一些著名学者，尽毕生的精力，撰写了大量的北京历史文献书籍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孙承泽的两部巨著——《春明梦余录》和《天府广记》。孙承泽祖籍山东益都，明朝永乐年间，明成祖命户部迁徙山东青州等府民隶上林苑，他也是世隶上林苑籍，因此，他实际上是北京人。孙承泽是明末崇祯进士，官刑科都给事中。到了清初，他又任吏科都给事中，官至吏部左侍郎。据他自己说，此后他便以“老病告休二十余年”。孙承泽的家住在前门外章家桥西，后来又搬家到风景秀丽的西山卧佛寺旁的樱桃沟，那里“有碣曰退谷”，因此他自号“退谷”。《春明梦余录》和《天府广记》两部书是孙承泽在老病告休的岁月里完成的。朱彝尊很推崇孙承泽，称赞他“博学鸿览，多识轶事”。当《春明梦余录》刊行时，大家争相购买，“几使洛阳纸贵。”孙承泽这二部书都以北京为主题，“历载先代典制景物”，“搜采广罗，文献彰著，洵为艺林之大乘”。（朱彝尊《天

府广记序》)朱彝尊编纂《日下旧闻》时,曾引用成书一千多种,他认为《天府广记》是内容最为丰富的,其他述作“皆不若退谷之《天府广记》致之尽而罗之广也”。(《天府广记序》)《天府广记》四十四卷分门别类,上自分野,下至建置、形胜、治署、风习、人物、名迹、题咏之属,无不尽详尽备,全书达五十三万多字,是研究北京城市历史、地理沿革、人物掌故和明代中央政府各官署职掌制度的宝贵资料。孙承泽写的这两部书,不仅是明朝人记明朝事,也是北京人编北京志,其史料价值很高。孙承泽不愧为著名的北京历史学家。《春明梦余录》现存的有抄本、康熙间内府刊本和光绪间广东古香斋袖珍本。《天府广记》存有抄本,1962年北京出版社据钞本标点整理铅印出版了六千部。

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,对北京的历史地理很有研究,他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亲身进行考古调查,写了《昌平山水记》、《北平古今记》、《京东考古录》和《万岁山考》等书,现存的只有《昌平山水记》和《京东考古录》二部,其学术价值很高,顾炎武也是一位北京历史学家。

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,认为北京自辽、金、元、明以来,为历代建都之地,应当有专书记述,于是发愤努力,采摘群书,自六经国史诗文别集百家二氏,以至海外载记,残碑坏碣,无不搜集,他采摘引用各种书籍共一千三百一十五部,辑录成了一部北京历史资料的专书——《日下旧闻》四十二卷。缪荃孙等人高度评价这部书,说:“古志都京者前莫善于《三辅黄图》,后莫善于《长安志》彝尊搜罗详洽,已驾二书之上,……然其考证之勤,搜罗之博,究非郭造卿、刘侗辈所可同日语矣。”朱彝尊的儿子朱昆田继承父业,继续搜葺补充,作了“补遗”,附在各卷之后。

到了乾隆年间,乾隆帝下令对《日下旧闻》进行补充和考证。由窦光鼐、朱筠等奉敕纂修而成《日下旧闻考》一六〇卷。编写此书时,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除对《日下旧闻》删繁补缺,援古证今,严加考核,按原书分为十三门外,还增设了官署、苑囿等

门，对原本有编次差错，体例不符之处，也一一加以移改。考证部分用“臣等谨按”四字标明，使人一目了然。此书是清代官修最为宏伟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北京地方历史文献资料。《日下旧闻考》除抄本外，只有乾隆间内府刻本（即武英殿刻本），各单位藏书很少，北京出版社正在整理出版。

清人吴长元，乾隆年间久住北京，是一位博学的文人。他留心掌故，重视调查研究，将自己考察所得，结合古籍和碑碣所载，对《日下旧闻考》中考证疏略未尽之处予以补充说明，错误不实之处，提出纠正质疑，编写了一部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的专书——《宸垣识略》十六卷。此书提要钩玄，去芜存菁，便于查阅，为研究北京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。此书最初刊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为池北草堂刊本，后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陆续再版，1964年北京出版社据乾隆刊本整理出版。

清朝康熙年间，张吉午等曾纂修了一部《（康熙）顺天府志》，这是清代最早修的北京志，缪荃孙等编纂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时并没有见到它，可见流传不广，很少人知道它。现存的是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的刻本，黄皮大字，全书共八卷，残存二至八卷，所存卷二“地理”（疆域、形胜、山川、风俗、物产、古迹、陵墓）；卷三“建置”（沿革、城池、公署、学校、坛壝、庙寺、邮舍、关梁）；卷四“食货”（户口、田赋）；卷五“典礼”（经费、祀享）；卷六“政事”（历官、职掌、名宦、武备、徭役）；卷七“人物”（徵辟、进士、举人、贡生、乡贤、理学、忠贞、劝业、廉直、儒林、孝义、节烈、流离、隐逸、仙释）；卷八“艺文”（册文、古诰、奏疏、议、论、书、序、记、传、箴、赞、赋、诗）。每卷前有“小言”。此书记事约至康熙二十四年，它是研究清初北京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文化的宝贵资料，据中国天文史料普查组的调查，此书全国仅存一部，如果不及时整理出版，将有可能失传。

清朝光绪年间修的《顺天府志》是清代后期修北京志规模最大

的一次。参加修志的大多是当时的名手，先后编纂了几年才告成功。光绪十一年(1885)成书，次年刊行。全书共一三〇卷，约三百五十多万字，引用各种书籍达七百九十三种之多。它是清代官修北京志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巨著。编者自称“语语征实，不取空文”，“征引必注原书，异同力求一是”。据总裁周家楣自己说：“考古难，证今尤难，盖采访诸端，一字未确，一节未稔，往往搁笔，至是乃条征件采，书牍并发，舟车踵接，日下耆旧，敦请考证，务尽所能，其日久无应，及访证弗获者，仍其缺，纂辑既齐，继以校讐，至十一年春，始以志书有成”。(序)此书史料价值甚高，为清末一些学者心血所凝成，书中一些考证，甚为详尽，至今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。《(光绪)顺天府志》当前所存的除一些稿本外，主要是光绪十二年(1886)刻本和光绪十五年(1889)重校本。重校本共计改削添补二千四百多字，比原刻本好得多，(见查光泰跋)。此书是研究北京地方历史的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。

在北京地方历史文献中，《通志》所记的“北京”部分，也是重要的资料。《畿辅通志》有三种，都是清朝时修的。第一部《畿辅通志》四十六卷，是于成龙、郭棻等于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)修的，同年刻印刊行，现在北京所藏此书甚少，大约只有几部。第二部《畿辅通志》一二〇卷首一卷，是清雍正年间唐执玉、陈仪等修纂的，现存清雍正十三年(1735)刻本和乾隆间刻本，都已很少。第三部《畿辅通志》三〇〇卷，是清同治年间李鸿章、黄彭年等修纂的。这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种，先后刊印过三次，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此书，但字迹太小，阅读很不方便。民国时期编修的《河北通志稿》中有关北京部分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民国时期也曾修过北京志，现存的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编写的《北平志略》，这是一部未完的稿本，撰者姓名不详，内容简略，且与《北平识略》和《北平游览指南》等书混订在一起。但此书

摘引了民国初期北京的一些资料，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北平，仍有些参考价值。

在敌伪占领时期，也修了一部《北京市志稿》一九四卷，吴廷燮主编，现存的是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稿本，此书记事至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止。有建置、民政、度支、文教、礼俗、宗教、前事、货殖、金石、艺文、人物、选举、职官等志，无序跋，有残缺。此书立场积其反动，但书中辑录的一些资料，尚有参考价值。此书仅有稿本一部，现存北京市文物管理局。

在北京地方历史文献中，北京郊区各县的县志，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，现存的北京郊区县志有大兴县志一种；宛平县志一种；房山县志六种；良乡县志三种；昌平州志七种；隆庆州志二种；延庆州志四种；永宁县志一种；怀柔县志二种；顺义县志五种；通州志四种；通县志三种；潮阴县志一种；平谷县志六种；密云县志六种，共五十二种。

在编纂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时，缪荃孙、傅文龙等曾专门编写了一卷《记述顺天事之书》，这是最早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专题书目。有的县志，缪荃孙当时未见，或以为已经失传了，但今天又发现了。例如：

明朝人崔学履纂修的《（隆庆）昌平州志》八卷，缪荃孙以为已佚，而现在发现一部明隆庆二年（1568）的刻本，十分难得而宝贵。此书是编者用十多年的时间，“考察群集、访求故实，尽出采访”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后撰写而成的。它是全国仅存的第一部昌平州志，是研究明代昌平的珍贵资料。

明朝人马龙川、黄榜纂修的《（万历）房山县志》八卷。据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载：“马永亨房山志佚，永亨见官吏传，万历庚辰永亨知县事，延训导晋州黄榜主修县志，《辽史拾遗》卷十四、《日下旧闻考》卷一百三十引之。”（卷122）可见缪荃孙等人当时没有看到此书，而现在发现了明朝崇祯年间的刻本一册，残存卷七“文章”（上）和卷八“文章”（下），主要辑录碑记、诗

集，如“房山八景诗”等。书末有顺天府涿州房山县儒学训导黄榜《房山县志跋》。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房山县志，这是很难得的书啊。

明朝人周仲士、史国典编纂的《(万历)怀柔县志》，始修于明万历三十一年(1603)，成于万历三十二年(1604)是最早的一部《怀柔县志》。缪荃孙等编纂《顺天府志》时，因没有看到此书而感叹：“史国典《怀柔县志》佚，国典事迹见官吏传，万历二十九年知怀柔，延蜀人周仲士勗修邑志。……此四论皆具卓识，未必逊于吴志，惜其书不传。《辽史拾遗》卷十四引之”。最近，我看到了一部万历三十二年刻本的胶卷，内容较为完整，卷首有朱之蕃、顾起元、周仲士、李辉《怀柔县志序》各一篇，编者自称此书“稽考得实，可垂鉴戒，”志书的内容都是“博访有据”的。书末有当时怀柔县知县史国典的《怀柔县志跋》。书中赋役部分，详述了明代怀柔人民的税粮、徭役、力差等沉重的负担，此书是研究明代怀柔的宝贵资料。

自清末至民国，有关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著述很多、如：震钧的《天咫偶闻》一〇卷(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刊本)；瞿宣颖的《北平史表长编》；张江裁、瞿宣颖等人先后编辑出版的《北平史迹丛书》、《燕都风土丛书》、《北京历史风土丛书》等等，这里不一一赘述了。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，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，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，首都的面貌与日俱新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解放后出版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，主要是整理和出版古代的名著。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北京史的专著和通俗读物。如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辑出版了《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》、彭明的《五四运动在北京》、侯仁之的《历史上的北京城》、《北京史话》、单士元的《故宫史话》等，这里不一一介绍了。

以上是个人阅读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一点认识，如有错误不妥之处，欢迎批评指教。